

# 舆论学视角下的汉代“月旦评”探析

■ 田素美 谢清果

**【内容摘要】**“月旦评”作为我国东汉时期的民间乡议活动,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产生和兴衰历程,基于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折射出古代中国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场相辅相成,又互为对立的关系。学界对于“月旦评”的评价莫衷一是,本文以“月旦评”为研究对象,从舆论学的视角入手,分析其兴起的社会环境、舆论特征及舆论功能,并探讨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为当今社会舆情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镜鉴。

**【关键词】**月旦评;舆论学;意见领袖;清议之风

“舆论”源于英文“Public Opinion”,国内翻译成“舆情”“民意”“公共意见”“公众意见”“公共舆论”都比较常见。甘惜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将“舆论”定义为“公众的意见或言论”。<sup>①</sup>“舆论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者态度”。<sup>②</sup>舆论既是个人社会心理的反应,表达了个人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心理和参政议政的自由,同时也反应了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评价,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环节。舆论是民情之所在,也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是国家政治传播的重要构成部分,舆论对个人和国家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网络时代的发展,为舆论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平台,社会舆论空前活跃,舆论危机更易爆发,严重影响政府形象的塑造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此,正确认识舆论的地位和作用,巧妙引导和利用舆论为政治传播服务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古代中国,舆论与古代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民情民意的诉求和表达,加强对社会舆论的掌控。上古时期,公众舆论监督就成为先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如《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sup>③</sup>可见,明台、衢室为黄帝、尧采纳民意的场所。夏代时,夏禹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循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循于路,求歌谣之言也。”也就是说,夏王派专官道人在路上敲木梆,巡行于各地,官员及百工众人可以歌谣的方式向道人进言。商代著名君主盘庚在动员殷人迁都时,曾“命众悉至于庭”,与群众商量迁都事宜,听取意见。周厉王时期,严禁民众议

论朝廷,召公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断,然而,周厉王依然“弭谤”不改,导致“国人莫敢出言”,三年后,周厉王被人民推翻、流放。春秋时期,诸国纷争,诸国国君深明人心向背,以开明姿态应对社会舆论。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相子产执政期间,民众常聚于乡校议论政事,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sup>④</sup>这说明子产不仅重视民众舆论监督,而且阐述了执政者对待舆论监督的办法:堵远不如疏,政府要学会引导舆论,让舆论服务于政治统治。秦至清代,舆论监督制度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设言谏制度,以“匡正君主,谏诤得失”,但是秦朝皇权膨胀,言谏作用甚微。两汉时期,言谏规模扩大,政策宽松。唐朝言谏制度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朝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言谏制度走向终结。由此可见,舆论与政权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关系,言谏制度虽然在限制君权、维护政治清明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依附于君主专制政体而又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面存在,消亡乃必然。

“真正对于传统社会里的政治起着舆论上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应当是蔓延于决策集团之外的士林中的自由议论”。<sup>⑤</sup>这种民间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面,在限制君权,维护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官僚言行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汉代民间舆论达到了鼎盛时期,以“月旦评”为代表。谢承《后汉书》曰“许劭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默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堰,为众所

服”。<sup>⑥</sup>足见其当时的社会影响以及对政治的舆论监督作用。

为何有如此巨大社会影响,作为民间舆论自身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与政治传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客观评价其社会影响?本文从月旦评产生和发展历程、舆论视角下其功能和影响、对后世启示等方面分析论证。

“月旦评”由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时间较短,研究成果并不丰硕。国内外学者多从家族学、人物评论、政治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月旦评”进行研究。归纳如下几点:第一,探讨“月旦评”产生发展历程及影响。如孙立涛《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sup>⑦</sup>、武剑青《汝南“月旦评”》<sup>⑧</sup>;第二,从门阀士族的形成或对士人的评析关照“月旦评”。如朱绍侯《试论汝南许氏望族的形成——兼论许劭月旦评》<sup>⑨</sup>、王素英《从汉代月旦评谈汉末名士风度》<sup>⑩</sup>;第三,从文学或美学的角度研究月旦评。如熊国华《《世说新语》品评人物的审美特征及影响》<sup>⑪</sup>、万久富《魏晋人物品评的语言特色》<sup>⑫</sup>;第四,将月旦评和清议一起纳入政治传播的范畴,探讨其对政治统治和政治传播的作用。如孙立涛《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sup>⑬</sup>及《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sup>⑭</sup>。学界鲜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视角专门研究“月旦评”,笔者从舆论学视角全方位观照月旦评,深入其内部文化肌理,理清发展脉络。从月旦评的兴衰过程寻找民间舆论产生及兴盛的环境,探讨与国家政治统治与国家舆论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希总结规律,为当今提供借鉴。

### 一、月旦评兴起及演变

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东汉末年由汝南郡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对当代人物进行品评、褒贬的一项评议活动,常在每月初一发表,故称“月旦评”。评议对象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以臧否人物,激浊扬清为目的,每个月品题都有变化。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因而闻名遐迩,盛极一时。月旦评社会影响之大,有其产生发展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兴盛及衰亡的历程,折射出古代中国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场相辅相成,又互为对立的关系。

#### (一) 民间与官方舆论场的角力 “月旦评”兴起

月旦评兴起在汝南地区兴起,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同时因许劭、许靖自身的社会身份、人格素养及其客观精准的评价,让其社会影响不断发酵。

1. 地域性成熟的人文环境促其产生。月旦评的兴起,有赖于当地发达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为其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汝南,古属豫州,上古时期,

豫州为九州之中,汝南又居豫州之中,故有“天中”之称。东汉学者应劭言“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养老致敬,化之至也。”<sup>⑮</sup>这说明当时汝南地区,政治经济实力强,道德风尚、文化素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化之至也”。同时,汝南地区是人才辈出之地。自古“汝颖固多奇才”。<sup>⑯</sup>自东汉初至顺帝年间,学术上曾涌现出一批蜚声海内的经学大师,如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等人,他们或享有“五经无双”、“五经纵横”之美誉,或收徒千万,贵为一代宗师。政治上更是凸显,《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封号的人物共35人,其中陈蕃、范滂、蔡衍、陈翔等均为汝南人士,并且在党锢名士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另外,汝南地区,门阀士族林立,政治地位显赫,如许氏、袁氏、应氏等豪门士族。这些门阀士族要不世代位居高官,要不为儒学世家,文化传承超过百年之上。总之,地域经济文化环境孕育了月旦评。

2. 汉代“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为月旦评兴盛提供了政治舞台。我国汉代实行“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从西汉时期就实行以地方基层组织乡里和亭为单位的“乡举里选”和“乡议清议”的选举制度。就是参照社会舆论对个人的评价来决定官员的取舍,将社会舆论作为选官取士的标准。官员的推举,以“孝廉”“贤良方正”等为标尺,注重德行的考核。《后汉书》注引《汉官仪》云“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可见朝廷选官对“孝悌清公”的要求,“察举”对于“征辟”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被举荐人的德行从何而来,最直接的来源就是“乡议”,即民间舆论,看民间对这个人的品行、道德的评价。月旦评作为最有影响的乡社舆论,找到存在的政治价值和政治领域发挥社会效应的广阔舞台,助其兴盛。

3. 清议之风盛行。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士人地位受到排挤。学子、士人已无法潜心于学术,他们以退为进,将精力放在对社会政治的关切和人物的品鉴人物之上。《后汉书》卷六十八《党锢传·序》:“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复公卿,裁量执政。”品题这项活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宦官发起“党锢之乱”的导火索。汉代察举、征辟的用官制度再加上政治时局的变化,引起社会上议论时政、臧否人物的“清议”风气。此为月旦评产生和兴盛的历史机遇。

4. 许氏兄弟名士身份及其客观精准的评价效果,扩大了月旦评的社会影响。月旦评社会影响巨大,与许劭、许靖兄弟名士身份及其刚正不阿的品格、精准的评价密不可分。首先,许劭、许靖是典型的“名士”,汝南名门士族,乡间士绅,祖上位列三公。《后汉书·许劭传》记载“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侯之”。<sup>⑦</sup>文中可见许劭、许靖兄弟显赫的家世以及刚正不阿的品格;其次,许劭、许靖自身德行高尚。“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sup>⑧</sup>这段话可以看出许劭聪慧、品格高尚,社会声誉良好;再次,评论精准,客观公正。许劭曾评陈寔为“太丘道广,广则难周”,论陈蕃是“仲举性峻,峻则少通”。<sup>⑨</sup>陈寔为当时名士中之“泰斗”,陈蕃则是名士中之“护法”,许劭对二人之品题,各为八个字,有褒有贬,恰如其分,客观公正。一时引得四方名士慕名而来,竟领二许一字之评以为荣。月旦评盛极一时。

#### (二) 士人论政的舆论光芒 “月旦评”的历史演变历程

综合月旦评产生及兴盛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月旦评的历史演进历程。首先,汉朝建立后为了修养生息,弥补战争创伤,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开国皇帝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言谏规模较秦有所扩大,统治者对于思想文化控制不强,诸子学说进一步发展,民间舆论环境宽松。汉武帝时期,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士人必修的课程和入仕的诱饵。政府通过修史、建立太学、确立察举征辟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学经——通经——入仕就成为士人追逐名利福祿的最佳途径。由此,朝廷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进一步实现,经学义理辩论之风盛行。班固对此有精辟的总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sup>⑩</sup>月旦评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言论环境,作为读经、通经入仕的门阀士子,许劭、许靖为士人树立了典范。

其次,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当权,清议之风盛行,月旦评进入了全盛时期。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外戚和宦官擅权轮流执政,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在政府机构随意安插浊流子弟和庸俗无才之辈。置“乡间评议”于不顾,“察举制”名存实亡。学而优的儒家士子通经入仕之途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阻碍,他们自觉挺身而出,发动社会舆论,臧否人物、抨击朝政,“清议”之风盛

行。士人“清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宦官政治的猛烈抨击,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他们言辞激烈、危言深论,甚至采用违法极端手段打击宦官、豪强等浊流;另一种主要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即“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这类人物品鉴以在野的郭泰和许邵、许靖最为出名。“清议”源于乡间评议。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指出“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sup>⑪</sup>。学者吴予敏认为“所谓汉末清议,不过是官僚集团与儒学集团中的‘清流分子’,对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舆论斗争。”<sup>⑫</sup>到了汉末士大夫清流分子与权宦集团与外浊流对抗之时,乡里公论仍存,但名士领衔的评论家成了公论代言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抨击时政,品评人物,推举人才,控制乡社舆论,地域影响巨大。对名士陈寔和陈蕃是品评客观、逼真、敢于直陈士林领袖的局限,轰动一时,为士人所推崇,从此月旦评风靡全国。两次党锢之际,名士官僚的清议受到了很大的挫伤,士大夫清流与宦官之间更加势不两立,月旦评以臧否人物为主的民间乡社舆论更加受到士人的欢迎和追捧。许邵洞悉时代需求,标榜自持,裁量德行,月旦评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寄雌黄于一人之口”,掌握人物毁誉之生杀大权。他们的品鉴评论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选官。得到正面评价的士人,仕途通畅;被负面评价,则如堕深渊。月旦评进入了鼎盛时期。

最后,东汉灭亡,诸侯割据,月旦评退出历史舞台。董卓之乱之后,东汉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名士逐渐逃亡各个割据政权,清议盛况不在,人物评论之风日衰,退缩为朝廷和割据政权举荐人才。桓帝、灵帝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在野的评论大家不复存在。月旦评虽盛行于一时,然持续时间并不太长。史书对于月旦评的消亡记载不多。“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sup>⑬</sup>。据记载,许劭因为与李逵有矛盾,与许靖有分歧,评论逐渐减少,月旦评进入了衰弱时期。十常侍当国,许劭目睹朝政腐败,天下将乱,不愿入仕,他说“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sup>⑭</sup>。乃南到广陵,投奔徐州刺史陶谦,后又转投扬州刺史刘哥于曲阿(江苏丹阳市),及孙策平吴,许劭又与刘霭南奔豫章(江西南昌市),并于兴平二年(195年)死于豫章,终年四十六岁。许靖因事得罪董卓,亦避难出走,随着许氏兄弟两人关系的破裂并分别离乡他走,月旦评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 二、“月旦评”的舆论环境、特征及其功能剖析

月旦评作为东汉末年“清议”的重要表现形态,其

实质是一种社会舆论(民间舆论),是当时民间意愿集中的表达,反映民意和民声。林语堂认为东汉的“清议”和“党锢”事件是“中国舆论史上舆论和统治当局之间第一次有组织的争论和冲突”<sup>⑤</sup>。月旦评作为民间社会舆论,既是我国古代社会乡社组织实施管理的一种方法和依靠力量,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形式。具备了社会舆论的特征、功能。现从舆论视角对其分析。

### (一) 月旦评的社会舆论环境分析

关于舆论,中国古代称之为“舆诵”“舆颂”“清议”,指众人的意见。现代对舆论的定义虽然说法不一,但是有如下几点是相同的:一是存在某个涉及到人们共通利益的问题或者事件。二是有许多个人对这个问题或事件有一种具有共同倾向性的意见,并且这种共同的意见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的提出,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并通过各种媒介及途径自上而下渗透到人心骨髓。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注重对民众百姓的道德教化,注重人格德行的提升。强调“仁、仪、温、良、恭、俭、让”,重视孝道。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态度的影响下,“入仕”成为涉及人们共通利益引起共同关注的问题,为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体。汉朝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使乡间评议(社会舆论)找到实现政治价值的舞台。考察官员,必先考其生平,察其乡邑之誉,根据社会舆论来鉴别德行。而对于官员的生平及德行乡社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月旦评”应时而生,将乡社对人物的德行评价通过代言人许劭、许靖之口,跨越时空定时(月旦)在乡间集中表达,通过乡社各种人际传播的途径,蔓延扩大。乡间评议一方面约束乡民的行为,巩固了乡间传统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为士人“入仕”积累政治资本,为政府举荐了人才。因此乡间流传“宁可就刑受戮,不愿为乡评所短”“一站清议,终身不齿”的说法。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君权神授”及传统的“学经——通经——入仕”的为官的政治体系彻底崩塌。士人“入仕”之路受到严重阻碍,舆论热点再次引爆,反对黑暗政治成为民间舆论的焦点。为了维护政治清明,实现士人“入仕”的利益。官僚集团合同“清流”分子与宦官和外戚集团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月旦评寓“抨击时弊”于“臧否人物”之中,将舆论影响扩大,进入了全盛时期。由此可见,月旦评作为社会舆论,在东汉末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二) 月旦评的社会舆论特征

1. 公开性。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往往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

公共问题作出公开的评价。月旦评作为一种乡社舆论,以人物品评为主要内容,将乡邻对人物德行的评价汇总,代表群体公众的意见,每个月初定时公开开评,每期品题不同,因许劭、许靖的名士身份和社会影响,乡民和士子参与人数自多,聚集听其评论,并形成议论,公开传播评论信息,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具有很强的公开性。

2. 公共性。月旦评舆论的公共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舆论指向的公共性与目标的公共性。月旦评舆论的指向主要包括人物评论(注重德行)和时政,而目标是,通过品评,以“清议”方式达到“举孝廉”和激浊扬清的目的。这一舆论对象和目标,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对于积极入仕的寒门子弟和豪门子弟都具有共性的感召力,社会普遍关注,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特点。

3. 广泛性与正义性。月旦评虽然发源于汝南地区,但是影响范围广泛且深远。宋人秦观有诗云“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sup>⑥</sup>。“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sup>⑦</sup>。从这些语句我们可以看出,月旦评影响巨大。后人视月旦评为“第一评”,因获月旦之高评而飞黄腾达,成为达官显宦者,在朝堂上威风凛凛,其风采超过公卿大臣。如果被月旦评贬低,如同坠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翻身。世人视月旦评如“风行草偃”具有“魔弹论”般的传播效果,虽然有些夸大,但是足见其影响巨大。因此,四方名士,慕名而来,就连曹操都讨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评论,大悦而去。月旦评影响广泛,除了许氏兄弟自身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品格及精准的评论之外,还存在如下原因:(1)许氏兄弟门阀名士的自身所带的“光环效应”。许氏兄弟,出身名门,祖上位列三公,是当地有名的门阀士族和乡绅豪佑,许氏兄弟积极聚贤荐能,黜恶罚奸,闻达宦府,交通乡民,影响极大且口碑好,是许多士子仰慕的对象;(2)许氏“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有些人会因为社交范围广,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和较高的学识背景而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人施加了个人的影响。在传播学中,把这样的人称为“意见领袖”。两汉时期,传播媒介并不发达,信息传递以人际口语传播为主,特别是对于广大的乡社,信息更是闭塞,外界信息很难传递到乡野,特别是政治信息,政治信息的缺乏与民众渴望入仕的愿望之间的形成矛盾对立的关系。许氏兄弟因为祖上多是政府高级官员,因此政治信息渠道多,并能就此发表简介和评论即“月旦评”。无形之中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信息可信度高,传播范围广泛。“士绅豪佑代表着乡社间人际交通的枢纽,控制着城乡之间,官民之

间交通的渠道”<sup>28</sup>;(3)士人开创的广泛的传播网络。东汉末年普遍讲经授学的风气,扩大了社会信息横向传播的网络,依附于豪门士族的知识分子利用各种传播途径,急速传播社会政治舆论。太学生和地方学生之间积极地交友拜谒活动,扩大了月旦评的社会影响。

4. 评价主观性与偏差性。舆论是一种意见,不是一般的客观陈述,而是对事物做出的判断,具有主观的倾向性和评价性。“乡间评议”作为乡民、士人口口相传的民间印象评议,难免带有主观倾向性,客观性很难保证。对士人“孝悌”的品评也难以公允全面,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月旦评作为一种民间舆论,偏差性体现在以下两点:(1)许氏兄弟主观的倾向性和阶级局限性。许氏兄弟作为士绅豪佑的代表,对人物和时政的评论也是从维护本阶层利益出发。“月旦评”之类的“清议”是统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并不能代表民众的心声,臧否人物,各怀私心,兄弟之间也存在分歧和压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2)东汉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严重限制了乡民的传播,士人掌握了广阔的传播渠道,特别是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往往左右着“乡间评议”的定论,为了获得良好的评议,士人们交汇应酬,品评标榜,互相恭维吹捧,甚至巴结掌管舆论之人现象时有发生,使得评价具有很大偏差性;(3)东汉末年,伪名士大量出现,社会道德根基败坏。为了获得良好的乡间评议获得“举孝廉”、入仕的机会,伪士子们或伪装孝行,或矫饰友悌,沽名钓誉。如陈蕃为乐安太守期间,民人赵宣“葬亲而不闭土延隧(用泥土涂抹的墓洞)”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陈蕃,豫章太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腹中所生。”于是怒其为人“诳时惑众,诬污鬼神”,遂治其罪。这个记载记录了“孝子”赵宣为父母墓洞守孝20年,乡间评议成为“孝”,官府“数礼请之”,并举荐给太守陈蕃,以便其入仕。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守孝期间是不能过夫妻生活的,但是赵宣却生了五个孩子,这显然是对传统的“孝廉”以最大的讽刺。伪名士的出现带来了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魏文帝曹丕为此曾痛心疾首,在《与吴质书》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时人赵壹更是愤而言道:“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sup>29</sup>伪名士的出现,也增加了月旦评论的偏差性。

### (三) 月旦评的社会舆论功能

月旦评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特殊时期的社会舆论,它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揭示了当时的官民关系,形成了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约束了民众行为,对政治

信息的传播功能不容忽视。

1. 对政府、官员政治监督功能。舆论作为大众的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相对集中、一致的社会心理反应,由于自身具备公共性、公开性、广泛性、评价性等特点,成为除政治、法律之外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积极发挥着政治监督功能。其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府政治制度的监督。月旦评作为汉末“清议”的典型代表,寓时政议论于品评人物之中,以褒贬时弊,激浊扬清,政治清明为目标。面对汉末的外戚宦官专政,“清流”分子以太学生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与朝廷的对立面的权贵分庭抗礼,攻击外戚与宦官。社会舆论与君主专制政权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之势。封建专制政权以“清议”“结党营私”为由,采取强制镇压手段,兴起了两次“党锢之祸”,社会舆论最终成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互相更替时期所借助的力量和权柄交争的筹码悲剧谢幕,月旦评随着许劭逃难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可以从封建专制政权对于“清议”的镇压而看到其对于政治统治的监督约束作用,社会舆论与君权专制统治历来势不两立,二者博弈,国家政治统治最终战胜了社会舆论。其二是对官员执政及言行的监督作用。月旦评以人物评论著称,品评人物时,除了对优秀孝廉人物大力褒奖举荐外,还对品行恶劣之人进行严厉辛辣的讽刺和贬斥,就连自己的亲戚都一视同仁。《三国志》记载许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协”。<sup>30</sup>足见许氏兄弟对人物品评不虚妄,不隐恶,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官员、豪门士绅即敬仰又惧怕,都纷纷收敛言行,唯恐受其恶评。“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sup>31</sup>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官员对许劭的敬畏之心,清廉执政,收敛言行。就连放荡不羁爱慕虚荣的袁绍,都害怕自己会引起社会舆论,约束自己的言行,简行回家。足见月旦评对官员执政及言行的监督约束作用。

2. 对民众的约束和鼓舞功能。“在古代中国,一乡一地的舆论,可举人也可杀人”。<sup>32</sup>月旦评作为一种乡社舆论,反应传统社会里乡民朴素的价值观。对传统农耕社会里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民有很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约束其遵守乡约,遵守乡间传统道德,鼓励村民简爱、互助、孝廉。成为乡间治理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作为察举征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个人前途命运,约束士人小心品行节操,隐恶扬善,为入仕争取舆论政治资本,无形之中也具有鼓舞其遵守传统道德的作用。

3. 政治信息的传播功能。月旦评作为汉末“清议”,以特殊的方式传播了大量的政治信息,表达了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意见。中国古代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占统治地位,乡社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介极其缺乏,政治信息很难到达乡土民间。许氏兄弟因其家族显赫地位,具备了获得政治信息的优先条件,同时作为乡绅豪佑成为乡社之间人际交流的纽带,控制了城乡之间,官民之间的传播的渠道,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意见领袖”。许氏兄弟以信息“把关人的身份”借用“月旦评”的传播形式,寓政治信息于人物评论之中,褒贬时弊,激浊扬清。在人物评论的同时,完成了政治信息的传播和反馈的双重过程,反映了民众对于政治统治的评价。汉末讲经授学的社会风气,扩大了政治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经学的主要受众群体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开拓了横向的社会信息网。京师太学生又和各郡的国学和私塾学生保持着频繁的交流互动——“以文会友”,延伸了信息传播的纵向网络。这些依附于名门豪族的知识分子利用人物品评(如月旦评)、民谣、谚语等口语传播形式,简要快捷地传递政治信息。当时社会上所谓的“乡里之号”“时人之论”“京师之语”满天飞腾。这些谣谚,即褒奖同党,又贬斥揭露政敌。比如朱伯厚敢于弹劾中常侍车骑将军匡超,谚语“车如鸡栖马如狗,嫉恶如仇朱伯厚”。<sup>③</sup>月旦评因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众多的太学士子,利用广阔的传播渠道和独特的传播媒介,反映社会舆论,传递政治信息,发挥社会政治功能。

### 三、“月旦评”的历史评价及当代启示

古今中外,对于月旦评的评价褒贬不一。褒如“许劭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黜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为众所服。”顾炎武层高度评价月旦评“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sup>④</sup>贬之“月旦,私法也”<sup>⑤</sup>“不过藉以植党树私,不足道也”<sup>⑥</sup>等。笔者认为评价月旦评应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重视其正面影响,辩证分析评价。

#### (一)“月旦评”作为古代民间舆论形态的积极意义

1. 激浊扬清、左右议论,改善社会风气。月旦评面对当时的昏庸政治,寓政治评论于人物品评之中,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不虚美,不隐恶,不中伤,能辩人之好坏,能分忠奸善恶。对政府、官员起到威慑、监督制约作用。以人物评论举荐乡间品行高洁的“孝廉”之士,左右乡间舆论,辅助乡社治理,约束乡民行为,维护传统道德规范。无论对于朝廷和地方都有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虽然效果有限。

2. 举荐人才,倡导入仕公平正义。月旦评以“人物品评”对当时朝廷宦官和外戚专权、卖官鬻爵交易现实予以揭露,为寒门士子振臂高呼,倡导正义公平维护“学而仕优”传统。同时,利用乡社评论举荐人才,为朝廷举荐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始发明樊子昭于膏幢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叔才乡间之间,摧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爵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于淹滞,或显之于童齿,莫不赖劫顾叹之荣。”<sup>⑦</sup>由此可见,和郭泰一样,许劭对那些才能突出,品行高尚的人举荐,并没有考虑其出身和门第,公平正义,尽力举荐,为国家举荐了优秀人才。

3. 月旦评推动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的产生。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朝廷中枢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评和士人“清议”,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主动权。许靖成为后来重要的中正官。具有进步意义。

当然,月旦评对后来的豪门士族的结党营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月旦评抑此扬彼的评论风格及评议的偏差性,也加剧了党派之间矛盾和斗争。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说“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讎,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sup>⑧</sup>余嘉锡先生则谓之“许劭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材,不过藉以植党树势,不足道也。”从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月旦评虽然能够举荐人才,但是评议主观倾向明显,加剧朋党之争,并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干涉,月旦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 (二)“月旦评”的当代舆论引导启示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月旦评”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舆论,随着历史的车轮已成为过去,但是“月旦评现象”并未消失。随着互联网和新传媒的发展,舆论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即刻瞬时,传播范围空前广泛,传播媒介多样化、立体化。同时,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社会舆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社会舆论是社会变动的晴雨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风向标。如何良性引导社会舆论,正确运用社会舆论为社会发展服务,值得政府和每一个公民深思。

月旦评的兴盛历程启示我们:其一,古代社会舆论的兴起,多产生于政治昏庸,政权交替之际。执政者忙于争权夺利,疲于政治斗争,无暇顾及清明政府形象塑造,开明政府舆论的传播,面对暴政,民怨起,民间舆论兴;其二,古代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现状,阻断了政治

信息传播渠道。政令不通,信息闭塞,官僚士绅与普通民众的政治信息不对称,“知沟”加大,“月旦评”成了民众获得政治信息的唯一渠道,因此,迷信“意见领袖”,追逐政治信息成为全民驱使,民间舆论空前强盛;其三,重视“意见领袖”对民间舆论的控制引领作用,对政治信息的“二级传播”功能。重视民间舆论产生的人际背景及其自身的偏差性,积极运用民间社团传播的力量,传递政治信息;其四,客观评判民间舆论的社会功能,并积极利用合理的成分。月旦评对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为广大士子争取公平公正的入仕环境,维护传统的道德伦理,功不可没,政府应积极吸收利用,清明政治,服务于政治统治。最后,正确认识民间舆论与政府舆论及执政的关系。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由来已久,“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民本思想最直接、深刻的反应,是民间舆论存在的最为厚重的文化土壤。但是民间舆论与封建专制的君主政权又形成二重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矛盾不可调和。如今,我国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代表了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间舆论与政府舆论虽然会有差别,但却具有终极目标的统一的关系,共同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互联网时代,我们首先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舆论与政治传播之间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统一关系,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测,充分发挥与利用“舆论领袖”的凝聚与传播作用;其次广泛开辟政治信息传播的渠道,政务公开,管理透明,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最后,加强政府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引领作用,主动设置“舆论议程”,将舆论形成过程由来源于群众转变为来源于政府,传播到群众中为主的路径,掌握舆论形成的主导权。形成民间舆论与政府舆论有效互动,政府舆论引导民间舆论,从而实现塑造中国政府良好世界形象、构建官民同乐的和谐社会之目标。

(本文系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长基金·创新团队”项目“海峡两岸舆论:动力机制及其演化轨迹研究”(项目编号:20720171005)的研究成果。)

#### 注释: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
- ② 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 ③ (春秋)管仲《管子下》,何怀远、贾歆、孙梦魁编,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 ④ (春秋)左丘明《左传》,刘利、纪凌云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9页。
- ⑤ 吴予敏著《无形的网——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 ⑥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77页。
- ⑦ 孙立涛《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 ⑧ 武剑青《汝南“月旦评”》,《兰台世界》2012年第11期。
- ⑨ 朱绍侯《试论汝南许氏望族的形成——兼论许劭月旦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民办教育研究专号)》2000年第1期。
- ⑩ 王素英《从月旦评谈汉末名士风度》,《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4期。
- ⑪ 如熊国华《〈世说新语〉品评人物的审美特征及影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 ⑫ 万久富《魏晋人物品评的语言特色》,《修辞学习》2001年第6期。
- ⑬ 孙立涛《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东方论坛》2017年第5期。
- ⑭ 孙立涛《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 ⑮ (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页。
- ⑯ 子彦《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 ⑰⑱⑲⑳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42页。
- ㉑ (清)顾炎武撰《日知录》,严文儒、戴扬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2012年版,第531页。
- ㉒㉓㉔㉕ 吴予敏著《无形的网——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38、134、140页。
- ㉖㉗㉘㉙㉚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42页。
- ㉛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 ㉜ (宋)秦观《孙莘老挽词四首》,周羲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9页。
- ㉝ (汉代)赵壹《刺世疾邪赋》,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15页。
- ㉞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 ㉟ (清)顾炎武撰《日知录》,严文儒、戴扬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2012年版,第532页。
- ㊱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 ㊲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5页。
- ㊳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下》,庞月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72页。

(作者田素美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谢清果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毓强】